

## 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

林香伶\*

### 摘 要

「南明」(1644-1683)有別於「明季」、「明末」、「晚明」(1573—1644)等詞，在明代正統王朝結束後(指崇禎帝自縊)，南明三帝及其忠臣烈士「偏安南方」，與清朝繼續對峙，產生「明代尾聲」和「清朝初始」的並時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

南社(1909-1923)以革命社團形態在出現，無論是文學／史學均在近現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南社大量從事「南明書寫」，包括對南明人、事、時、地、物的感懷吟詠和對南明史料、史事的記錄、搜羅，引領南社發展的柳亞子無疑是最具指標作用的人物。是以本文以柳亞子個人的「南明書寫」作為研究標的，經由南明史料蒐集與撰寫歷程、南明史及人物的書寫等議題，就其早年熱心閱讀南明史集，寫作〈鄭成功傳〉、〈夏內史傳略〉、〈中國滅亡小史〉、《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等文為主軸；進而探討清末與民國中日抗戰時期的柳亞子，如何在黎里、上海、香港、桂林等地拓展南明史的寫作及研究工作。希望見出柳亞子為抒發時代感懷和凝聚國族認同，形成有別於一般史家結集歷史文獻，藉以重構「南明」歷史記憶的特殊意涵。

關鍵詞：南社、南明、南明書寫、柳亞子、歷史記憶

---

2006.1.9 投稿；2006.4.10 審查通過；2006.4.28 修訂稿收件。

\* 林香伶現職為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Era Sentiments and Country Validations ——Study Nan-Ming Writing of Liu Ya-Tzu

Lin Hsiang-ling\*

### Abstract

The word of “Nan-Ming” (1644-1683) is different means of “Ming season”, “end of Ming Dynasty”, “late Ming Dynasty” (1573- 1644). After the orthodox imperial court fin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mean the Chong-Zhen emperor hung oneself), the continue confronting with Qing Dynasty by three sovereign and many martyrs in south. It also produces “Ming Dynasty coda” and “Qing Dynasty initial”, special in history.

Nan Sheh (1909-1923), a revolutionary group at initial sta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It worth attention that Nan Sheh society engaged in Nan-Ming writing in a large amount, including the personage, the events, the occurrence, the deep feeling to Nan-Ming and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data, record of historical event. Among them, Liu Ya-Tzu is most important people Nan Sheh society's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Nan-Ming Writing of Liu Ya-Tzu from the Nan-Ming historical papers collection, writing progress, Nan-Ming biography and personage. Though Liu's writing of “Zheng Cheng gong biography” (鄭成功傳), “Xia Nei Shi brief biography” (夏內史傳略), “The vanish biography of China” (中國滅亡小史), “Nan-Ming biography” (南明史綱) and “The personage of Nan-Ming” (南明人物志), we investigated the writing and research work of Liu Ya-Tzu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Lili, Shanghai, Hong Kong, Gui Lin. We hope to express the Era sentiments and country validations of Liu Ya-Tzu, and generally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views with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 then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un-Ghai University.

memory and special meaning of Nan-Ming again.

Keywords: Nan Sheh , Nan-Ming, the Nan-Ming Writing, Liu YaTzu,  
historical memory

## 一、問題的緣起

柳亞子（1887-1958）在近代中國的研究價值，不惟是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首腦人物，其聲名遠播與其掌握傳媒、社群、政治各界的人脈，扮演多重身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柳氏著作經由其子柳無忌（1907-2002）等人的努力，一一付梓出版，學界對柳氏的關注，也隨之水漲船高，蔚為一股風潮<sup>1</sup>。然而，柳氏除龐大的文學創作，積極投入蘇曼殊研究，奠定蘇曼殊在近代文壇浪漫詩僧地位等貢獻外，他對南明史料的掌握、「南明書寫」的成果，展現有別於一般文人的史學能力，其學術貢獻也不容漠視。

本文所界義的「南明書寫」，就「南明」的時代斷限而言，即：

從公元一六四四年即明曆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三日弘光帝監國南都起，到公元一六八三年即明曆永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十三日漢奸施琅入東寧，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為止，共計四十年。這四十年的歷史，正是漢人和韃子鬥爭的歷史。這四十年間統治漢族的代表者，是南明三帝和延平三王，還有一個旁生側挺的魯監國。<sup>2</sup>

簡言之，柳亞子以朱明王朝滅之後，南明三帝（福王弘光帝朱由崧、唐王隆武帝朱聿鍵、桂王永曆帝朱由榔）、延平三王（延平王朱成功、延平嗣王朱經、延平幼王朱克塽）及魯王朱以海被忠臣義士所擁戴的四十年歷史作為根柢——「南明」是也<sup>3</sup>。就「書寫」內容而言，應分三方面來看：一是實際撰著有關南明人物、史事的「史籍」著作，二為南明史料評介，三指以南明人物、史實為對象的文學創作。進一步言，「史籍」指《南明史綱》、《南明史綱歷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及南明人物傳記十餘篇等直接書寫南明史事、人物；「南明史料評介」則由〈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一年來對於南明史料的工作報告〉、〈還憶劫灰

<sup>1</sup> 柳亞子研究盛況，可參見管林，〈40年來柳亞子研究述評〉，《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1期，2001年2月，頁14-17。

<sup>2</sup> 引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頁291。

<sup>3</sup> 同上註，頁291-292。

中的南明史料〉、〈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南明史料序、跋、匯輯〉等文，形成一種以史料評介（外化）及個人記憶重構（內化）的雜揉書寫形式；至於以文學形式（包含詩詞、文、戲劇）從事的「南明書寫」作品，則與上述史籍及評介相互輝映，流露文人特殊的歷史情懷。

與一般史學家相同的是，柳氏極為重視歷史文獻目錄、版本、校勘等基礎知識和考據、辨偽、輯佚等實證功夫，此外，在友人協助之下，柳氏取得大量的南明史相關文本，以文人（特別指文學家）之姿另行發展一套有別於史家客觀理性史學規範而建構的「南明書寫」，分別在青少年、中年等不同階段，寄託了個人生命的主觀情志、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的意識，甚少受到學界注意<sup>4</sup>。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尋索柳亞子與南明史料相遇的過程，探究其「南明書寫」的實際內容及獨特的史觀，企圖還原中國近代史一個「南明書寫」個案的真相。

## 二、柳亞子「南明書寫」的史料蒐集與撰寫歷程

清朝前期的「康雍乾盛世」都以「稽古右文」自詡，除了政經軍教有所建樹外，《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的完成，更是中國文化研究的重要寶藏。在此同時，文字獄案件大興——涉及「敏感的南明歷史」及「明末清初史事的書籍」也在禁毀之列<sup>5</sup>。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腐敗將亡，箝制人民思想的勢力式微，南明野史筆記的搜羅、南明史事的撰寫才開始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柳亞子正巧搭上這班南明史研究的列車，從青少年到中年，從黎里到上海、香港、桂林，「南明書寫」就此開展。

<sup>4</sup> 在研究柳氏南明史的論著中，學者著力「介紹」其研究內容及收集史料的過程，較少針對其「南明書寫」作深入的「論述」，諸如：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古今》55期，1944年9月16日；謝國楨，〈愛國詩人柳亞子與南明史乘〉，《歷史教學問題》1981年第1期；李鏞，〈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下落之謎〉，《文教資料》1987年第5期；柳無忌，〈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同前）；王國平，〈柳亞子與南明史〉，《蘇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史全生，〈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頁110-113，等篇均是。

<sup>5</sup> 有關中國近代南明史研究的興起概況，可參見馬金科、洪京陵編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1840-19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5月），頁101-105。

### (一) 青少年閱讀與牛刀小試

在現存柳亞子自述研究南明史的文章中，柳氏多半交待自己從事南明史研究是從 1939 年夏天伊始（民國二十八年），事實上，成就日後柳氏決意投入南明史料的搜羅、研究，其「遠因」肇端於青少年閱讀的興味和幾篇在報刊展露頭角的南明短文。在〈潘節士力田先生遺詩序〉一文中，柳氏寫道：

余自束髮受書，即有志里中文獻，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義士佚民遺老之書。蓋當宇宙膾腥，華夷混合，而能艱貞蒙難，捨命不渝，其孤忠亮節有非人人所能幾及者，非徒以文字為粉榆重也。稍長，從陳子巢南游，搜討益力。巢南既輯吳長興伯及赤溟節士遺集刊行於世，而余亦獲長興客問十三篇。結習所關，輒詫為奇遇矣。然當是時，義旗履仆，胡焰猶張，名士新亭，自悲身世，一讀其書，每為低徊往復，至於泣下沾襟不能自己，此中耿耿，誠有未易為流俗人道者。<sup>6</sup>

柳氏在此序文中回顧從事南明研究、廣收里中文獻的過程，並非一時興起，其背後隱含對鄉里前輩的崇敬和與前賢書簡的「奇遇」，令他動容感慨。而陳去病（1874-1933）廣收南明遺著，曾輯錄《陸沈叢書》、整理吳易《吳長興伯遺集》和吳炎《吳赤溟先生遺集》等書，無疑是日後柳氏從事「南明書寫」的啟蒙先師<sup>7</sup>。再者，柳亞子從事明季人物、史事的編撰和收集，正好與晚清國族主義建構的需要相互呼應，換言之，若對比晚清大量興起明遺民「再發現」的研究風氣，柳氏對南明史料的興趣，正好為晚清出版明末史料注入了重要資源。

1903 年，柳氏在家中舊書堆中發現兩部鈔本，即二十卷本的《南疆逸史》與《海甸野史》，此時，「對於南明史實最初發生興趣；同時，也粗粗地知道一些南明史實的輪廓」<sup>8</sup>。之後，青少年柳亞子在南社成立

<sup>6</sup> 本文正式發表時間為 1914 年（民國三年），但實際寫作時間應在 1912 年（民國元年），參見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313-314。

<sup>7</sup> 陳氏與亞子之父同為長洲大儒杏廬弟子，二人於 1902 年赴吳江縣城應考結識，日後柳氏加入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創立南社，都與陳氏交遊甚密。陳氏曾輯錄《建州女直考》、《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忠文殉節記》等四書為《陸沈叢書》，亞子於 1906 年發表唯一的小說作品《陸沈記》應是受到陳氏啟發。

<sup>8</sup> 引自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頁 293。

前，陸續完成〈鄭成功傳〉（載 1903 年《江蘇》第 4 期，署名「亞廬」）、〈中國滅亡小史〉（載 1903 年《江蘇》第 6 期及 1906《復報》第 3 至 10 期，署名「中國少年之少年」）、〈台灣三百年史〉（載 1903 年《江蘇》第 7、8 期，署名亞廬）、〈夏內史傳略〉（載 1906 年《復報》第 6 期）、〈吳日生略傳〉<sup>9</sup>等文逐漸展露頭角。在其自撰年譜中，特別提到 1904 年「讀夏存古，張蒼水諸家集，並及全謝山《鮎埼亭文內外集》，為搜討南明故事之始」，1907 年「讀明、清間吳江諸前輩詩文集，為搜羅鄉邦文獻之始」<sup>10</sup>，但一心被革命事業吸引，高舉推翻滿清旗幟的柳亞子，卻是延宕了三十年之久，才與年少時的「南明因緣」重逢。

## （二）「活埋」時期的知音互往

1909 年至 1923 年，是南社主要的活動時期，當時柳亞子專心投入南社社務，除了零散的詩詞創作外，在「南明書寫」部分幾近空白<sup>11</sup>。然而，在經歷滿清覆亡、南社分化、北伐挫折後的柳亞子，卻已年過五十，他在抗日期間滯留上海，那段「髫年時就有的嗜好」<sup>12</sup>——研究南明史料的青少年記憶逐漸被呼喚，於是，他選擇足不出戶，與世隔絕的「活埋生活」三年，正式大舉從事精密殷勤的「南明書寫」。

1937 年 7 月 7 日（民國二十六年），日軍在蘆溝橋發動進攻，北京、天津相繼淪入日軍之手，此時的柳亞子雖受神經衰弱的腦疾之苦<sup>13</sup>，仍憤慨抒懷，陸續在《申報》發表〈維滬察北〉、〈大時代下青年的使命〉<sup>14</sup>

<sup>9</sup> 在史全生，〈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第四期（1994 年），頁 110 一文中，註明上述諸文亦在《醒獅》、《民報》等革命刊物上發表，且以為〈吳日生略傳〉乃柳氏所作，但筆者在現有柳氏著作、年譜等相關資料均未見此文，暫存疑之。

<sup>10</sup> 引柳亞子，〈自撰年譜〉，《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9、11。

<sup>11</sup> 南社活動期間，柳亞子僅在《南社叢刻》發表〈和巢南九月十九日顧端木劉公巨錢彥林夏存古諸公三十餘人殉國於南紀念日詩二首〉、〈巢南書來謂將刊長興伯吳公遺集先期得公真跡小札一通又得王山史先生所撰夏內史傳及為內史營葬事甚詳喜極馳告索詩紀之應以四律〉（均見《南社叢刻》第二集），以上六首乃柳氏與陳去病相和之作，故言南社時期柳氏在「南明書寫」上幾近空白。

<sup>12</sup> 同註 10，頁 222。

<sup>13</sup> 柳氏雖值壯年，但於〈八年回憶〉一文自述：「腦病是愈來愈深了，失眠成為經常故事，消化不良，腸胃作痛，便不病發生起來」，文同上註，頁 219。

<sup>14</sup> 二文分別刊於《申報》8 月 2 日及 8 月 29 日，今二收於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下），頁 1188-1191。

等文，希望青年同胞肩負「抗敵救亡」重責，遺憾的是，淞滬之戰歷時三月後就宣告失敗。柳亞子面對摯友訣別、病逝<sup>15</sup>，「自恨孱軀」的他取王夫之「七尺從天乞活埋」之句，自署住所為「活埋庵」，從此潛心撰著，蟄居寓所，「活埋」上海三年。據柳氏回憶文自述：「這三年中間，出大門好像始終不過六、七次」<sup>16</sup>，而「全力從事南明史研究，大部分著作都在這時期完成」<sup>17</sup>，《南明史綱》、《南明史綱歷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及南明人物傳記十餘篇等實際的「南明書寫」內容，陸續問世。

「活埋」上海時期，阿英（錢杏邨）扮演柳亞子正式著手「南明書寫」的關鍵角色，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阿英明清文學、史料藏書豐富，與柳氏興趣相投；慨然借書，為柳氏從事「南明書寫」提供紮實的基礎；引介鄭振鐸（西諦）與柳氏相識，拓展柳氏「南明書寫」的視界。二、阿英積極創作南明史劇，錢、柳二人為此經常書信往復，熱烈討論，情誼俱增。〈《海國英雄》敘〉一文可為說明，其文云：

我和如晦先生的交誼，是以討論《碧血花》史劇為推進之契機的。因為如晦先生有創造南明史劇四部——《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懸壘神猿》的計劃。而我平常好談南明史實，便接連不斷的通信起來。……他把他全部的藏書，關於南明史料的差不多有三百多種，亨白郎地都借給了我。<sup>18</sup>

魏如晦乃阿英發表南明史劇時使用的筆名，在柳亞子文集中，曾多次為其劇作寫敘<sup>19</sup>，而阿英寫作史劇時，也接受柳氏不少建言，融入「鑒往所以儆來」的史劇創作觀<sup>20</sup>。就阿英南明四劇觀之：《碧血花》寫弘光

<sup>15</sup> 指柳氏友人何香凝、廖夢醒等人遠赴香港，經亨頤、胡寄塵、劉季平等相繼過世諸事，參見張明觀，《柳亞子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頁402-403。

<sup>16</sup> 同註10，頁219。

<sup>17</sup> 同註8附錄，柳無忌〈編後語〉，頁448。

<sup>18</sup> 同註6，頁1258。

<sup>19</sup> 柳氏為阿英史劇寫敘，為兩人紀念友誼撰文，計有：〈魏如晦《碧血花》歷史劇敘〉兩篇、〈《海國英雄》敘〉、〈懷念阿英先生〉、〈雜談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劇〉等文，均收入《磨劍室文錄》（下），頁1227-1230、1259-1262、1331-1335、1348-1363。

<sup>20</sup> 同上註，〈魏如晦《碧血花》歷史劇敘〉兩篇以「鑒戒」、「鑒往所以儆來」等歷史使命之語等同歷史劇使命。

時代，「借孫克咸與葛嫩娘的故事，來指點馬阮誤國的醜態」，此時柳氏已與阿英開始通訊討論史劇創作的問題；《海國英雄》「以延平王鄭成功為主角，來表現隆武一朝史實」，則採柳氏意見寫入延平王創辦天地會一事；而《楊娥傳》以永曆時期女傑楊娥為主人翁的靈感，則是緣自於柳氏的推薦，可與柳氏〈楊娥傳〉、「楊娥年表」相互參照；《懸壘神猿》計畫以張煌言為主角，書寫魯監國一朝史實，也和柳氏「南明書寫」的重心相當接近。

阿英給予柳亞子「南明書寫」的實際援助，可從〈懷念阿英先生〉得知一二，但柳氏記憶不免有誤，其文云：

關於南明歷史的書籍，阿英先生藏本甚多，在我研究的過程中，幫了我非常的大忙，我處所有南明史料的來源，一部分是阿英先生代我搜購來的，如《史外》、《南疆譯史》、《小腆紀傳》、《小腆紀年》、《晚明史籍考》之類；另一部分是他借給我的，如《痛史》、《明季禪史》、《明季南略》、《台灣外記》之類。可惜這一次在港變中，完全丟掉了。<sup>21</sup>

上文提及的「港變」應指太平洋戰爭，1940年12月，柳氏從上海赴港後又流離桂林，藏書幾乎付諸東流，所有上海得書的過程、內容，端賴日後的記憶重整。〈《海國英雄》敘〉一文言阿英共贈予三百多部書，但從柳氏相關文獻的片斷記憶僅可統整阿英提供柳氏南明史籍的方式，應有代購、代借、借閱、贈予四種途徑，實際書目難以確定，部分藏書來源說法也諸多歧異。

另一名提供柳氏取得南明史料的重要友人，則是同為南社社友的胡樸安，柳氏多次藉由書信透露自己對南明史料的高度興趣，離滬之前，還不忘以「收京夢裡精魂熱，野史亭邊退筆多」<sup>22</sup>詩句表達輯錄南明史的心志；此外，為了請胡氏代為索閱程演生藏書《野史無文》，信中時有「急欲一睹」、「千萬拜託之至」、「不勝感激之至」等語，顯示柳氏濃烈索書的意願。至此，柳亞子借友人力之搜集的南明史料逐漸豐滿，可以下列簡表見之：

<sup>21</sup> 同上註，頁1334。

<sup>22</sup> 詩名〈次韻和樸安即以爲別〉，見柳亞子，《書信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頁226，附於1940年11月26日致樸安信後。

■柳亞子友人提供南明史籍簡表

提供者	地點	性質	書名	作者／版本	備註
阿英	上海	代購	《晚明史籍考》	謝國楨著	柳亞子視此書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鑰匙」
			《小腆紀傳》	徐鼎著	購書後，歸還向鄭振鐸處借開明圖書館藏本
	香港	代購	《海東逸史》	翁洲老民著	
			《見聞隨筆》	馮蘇著	
			《記載滙編》	申報館仿聚珍版本	共計馮夢龍《燕都日記》、無名氏《董心葵事記》、朱子素《東塘日筭》、沈濤《江上遺聞》、華廷獻《閩事記略》、江之春《安龍記事》、章學誠《戴重事錄》、墅西逸叟《過壚志》、計六奇《金壇獄案》、無名氏《辛丑記聞》
	阿英	上海	代借	《華延年室題跋》三卷	傅以禮著
胡樸安	上海	代抄	《野史無文》		程演生藏書，胡氏託人代抄後自滬寄港
阿英	上海	贈予	《痛史》	1911至1912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包含三十種史料

			《梨洲遺著滙刊》	1915 年中華書局排印本	黃宗羲作品三十二種
			《吳長興伯集》	1907 年國學保存會排印本	陳去病編印
胡樸安	上海	贈予	《明清記略目錄》		
阿英	上海	借閱	《荊駝逸史》五十五種		
			《明季稗史初編》十六種		
			《明季稗史初編》六種		
			《滇粹》二十一種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四十五種		
			《所知錄》五卷	錢秉鐙著	
			《明季南都殉難記》不分卷	屈大均著	
			《劫灰錄》五卷	無名氏著，國學保存會鉛印本	原題《珠江寓舫偶記》
			《張文烈公遺詩》一卷	張家玉著	
			《張蒼水集》二卷及《張蒼水全集》十二卷	張煌言著	
			《嶠雅》二冊	鄭露著	
			《明季南略》十六卷	計六奇著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	楊陸榮著	
			《史外》三十二卷	汪有典著	
			《南疆繹史》五十卷	李瑤著	
			《小腆紀年》二十卷	徐鼎著	
			《台灣外記》十卷	江日昇著	
			《偽鄭逸事》一卷	郁永河著	
			《台灣鄭氏始末》六卷	沈雲著	
			《鄭延平年譜》一卷	許浩基著	
胡樸安	上海	借閱	《聖安記事》和《明季實錄》	吳縣朱氏槐廬校刊本	《亭林遺書》之一
孫仲瑛	香港	借閱	《永曆實錄》二十六卷	王夫之《船山遺書》鉛印本	
			《勝朝粵東遺民錄》四部	陳伯陶輯錄	
阿英	香港	未明	《台灣外記》六冊	江日昇著／進步書局石印本	
			《台灣鄭氏始末》六卷	沈雲著／吳興叢書木刻本	

### （三）香港羿樓與桂林流離

在許廣平、王任叔、朱舜華、阿英等友人大力勸說下，1940年底，柳亞子抵港，寄居九龍「羿樓」。在港期間，柳氏自述完成兩件「機械的」工作：一為繼續修正《南明史綱》，將六卷的形式擴充到八卷；二為整理屈大均遺著《皇明四朝成仁錄》<sup>23</sup>。至於離滬前夕趕寫的《南明后妃宗藩志》一書，柳氏原意出版《羿樓叢書》，卻因戰爭未果，全稿已不存，只能以零星方式發表幾篇單篇傳記<sup>24</sup>。

不過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九龍、香港相繼淪陷，柳亞子倉促逃難之際，一本書都沒有帶走，為了紀念羿樓舊籍，神經衰弱病痛復發的柳氏數度向頹弱的記憶力挑戰，陸續撰寫〈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三篇文章，尤其在〈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中，柳氏寫下一段文字，讀來引人鼻酸，其言曰：

……我在那裡，以真真活理的心情，呆過了民國三十年的歲尾。直到民國三十一年年頭，始復由友人照料，經過八天八夜坐帆船飄洋過海的生活，輾轉以達海豐的馬貢。以後一路多病多痛地，行行止止，涉水登山，比及安抵桂林，已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七日了。除了身命和眷屬都僥倖無恙外，羿樓藏書的損失，對於我是一個不可磨滅、不可回復的創傷。<sup>25</sup>

為了重整記憶中的羿樓藏書，柳亞子靠著《大風》、《筆談》兩本雜誌和廣西省圖借來的《晚明史籍考》，以半個月之久的時間，回溯從《罪惟

<sup>23</sup> 柳氏在港活動詳見〈一年來對於南明史料的工作報告〉，《南明史綱·史料》，頁313-326。

<sup>24</sup> 有關《南明后妃宗藩傳》一文的內容，據柳氏自己的說法就有二種：一為后妃傳、追尊三帝傳、諸王傳、宗室傳四種（〈我的南明史研究經過〉附紀，1940年上海）；二為南明后妃傳一卷、南明追尊三帝傳一卷、南明儲貳傳一卷、南明諸王傳若干卷、南明宗室傳若干卷五種（〈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2年桂林），二說歧異在於南明儲貳傳的有無，今已不可考。《南明后妃宗藩傳》分正本、副本，柳氏原意將正本交由胡仲持經《華商報》出版，副本則交茅盾擬於《筆談》發表，南明追尊三帝傳則另交友人保存，但因香港戰火瀰漫，這些計畫都付諸流水。

<sup>25</sup> 同註23，頁364。

錄》八十四卷至《晚明史籍考》二十卷的零散記憶，才於 1943 年 3 月完成一百二十四部藏書記憶記錄，事實上，這些記憶遠遠「不及藏書之半」，柳氏僅能慨嘆「腦力所限，追憶為難，無可如何也」<sup>26</sup>。

桂林生活稍稍平穩後，1943 年 1 月，柳亞子與南明靖江王裔孫，任廣西省通志館編纂朱蔭龍共同起草《南明史編纂意見書》；次年 5 月，再與朱蔭龍、宋雲彬等人聯名創立「以搜集南明史料，加以研討，輯成《南明紀年》、《南明紀事本末》及《南明》三書為宗旨」的南史社（又名「南明史料纂徵社」）<sup>27</sup>，大張旗鼓規劃《南明史料匯編》、《南明史料新編》、《南明史料月刊》的出版。可惜日軍再度舉兵南下，長沙、衡陽相繼淪陷，柳氏逃往重慶，南史社僅曇花一現，即化為泡影。

值得一提的是，1944 年 9 月 16 日，王瑞豐在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 55 期發表〈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說明香港羿樓雖曾落入日軍之手，但南明史籍多數完好；1949 年 7 月，柳亞子在《夏太史遺稿》末頁回應王氏的高誼<sup>28</sup>；1950 年 11 月，柳氏將在滬期間舊藏的明清古籍、鄉邦文獻和南社時期編印的書刊數千種，全數捐出（現藏上海圖書館）；同年 12 月，再將北京寓所存藏的南明史料、南社文庫、革命文庫悉數捐贈北京圖書館；1987 年 5 月，吳江黎里成立柳亞子紀念館，廣收柳亞子著作及藏書，柳亞子與南明的因緣故事，遂為地方美談。

### 三、南明史書寫：以〈中國滅亡小史〉、《南明史綱》為中心

在柳亞子「南明書寫」系列作品中，柳氏曾多次增訂《南明史綱》，可見柳氏對此書編纂的重視。促使柳氏動了「編寫《南明史綱》的野心」，則是緣自於閱讀上海國光書局排印本《南疆逸史》時的「不很痛快」和「不大方便」<sup>29</sup>，以及對南明史料的特殊情感。但就柳氏「南明書寫」形成的脈絡看來，應從〈中國滅亡小史〉開始探看其南明史書的內涵。

<sup>26</sup> 柳氏所列羿樓藏書見上註，頁 364-419。

<sup>27</sup> 同上註，頁 138-139，〈南明史料纂徵社條例〉一文。

<sup>28</sup> 同上註，頁 440-446。

<sup>29</sup> 同上註，頁 293-294。

### （一）青少年史筆：〈中國滅亡小史〉

〈中國滅亡小史〉是柳亞子首次嘗試以紀事本末體方式的史書撰寫，此文寫於1903年，延至1906年7月16日才以「中國少年之少年」筆名在日本發行的《復報》（第3至第10期）連載<sup>30</sup>。

本文採黃帝紀元方式紀年，除緒論、結論外，正文有：〈中國滅亡之慘劇〉、〈滅亡後之中國〉、〈洪氏之光復軍〉、〈民族主義之風潮〉四章，各章再以事、人、組織為綱，羅織整個書寫架構。柳氏所謂「中國滅亡」，意指滿清入關執政開始，通篇文字排滿意識強烈，鼓吹革命行動明確，情感激昂。從全文書寫架構觀之，柳氏雖然以〈中國滅亡小史〉命名，除第一章以「滿洲之起源」、「多爾袞入燕京」、「南都之敗」、「揚州、嘉定、江陽之屠戮及剃髮令」、「隆武帝之流血」、「浙東之淪陷及魯監國之末路」、「湘粵之亡」、「永曆帝之遇害」、「鄭成功」、「台灣之亡」等節順時敘述明亡的歷程外，其餘各章均是清朝歷史，書寫重心似乎擺在「滅亡後之中國」，呼喚民族意識及民權主義的用意尤其鮮明，〈緒論〉和〈結論〉可為印證，其言：

辱莫辱於奴隸，哀莫哀於亡國。亡國者，不祥之名也，可痛之事也。異種橫來，神州淪陷，銅駝荊棘，鬼哭磷飛。……吾誓以亡國之觀念，救我祖國。同胞同胞，猶以我祖國為未亡乎？則試張目北望，神馳燕雲之郊，彼高踞獨夫椅上，握全國生死予奪之主權之戴活、那拉，豈猶是我神聖祖宗黃帝之華胄耶？……後生末學，口不讀揚州、嘉定之記，耳不聞永明、延平之名，抑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銷沈也。某也不敏，私抱此願，網羅佚事，組織成篇，為鼓吹之一助。……我義俠之同胞，有讀此而興起其獨立革命之事業者乎？搗骨為塵，我目瞑矣。（〈緒論〉）

……歷史之良窳，視乎民權之消息。中國二千年來無民權，故二千年來無良史。……吾一字一滴血，一令一斷腸，亡國之痛其如此矣。……胡焰既衰，決不能再以文字之獄我同胞，則鼓吹不患其中止，特視我民之實行何如耳。……（〈結論〉）

<sup>30</sup> 此文現編入《磨劍室文錄》（上），頁15-71。本段論述引文均引自此，不再作註。

柳亞子呼籲國人以炎黃子孫自居，視滿清為「異種」、「偽政府」，提醒同胞自清人入關以來，中國亡國已逾二百年，之所以膽敢以「文筆固陋，詞不達意」撰寫此文，無非是希望鼓吹革命，推翻滿清，解民於倒懸，中止亡國之痛。1902年，《新民叢報》、《清議報》等書曾被柳氏視為「枕中鴻寶」，他自命維新黨，將龔自珍和梁啟超視為「兩尊偶像」、「文字上的導師，思想上的私淑者」；柳氏於1903年加入愛國學社，認識章太炎、鄒容等革命派文人，本文談及民族、民權主義，恰巧可以看出柳氏思想的轉變，這一年，正是柳亞子涉獵南明史料的開始。

此外，觀察〈中國滅亡小史〉書寫語言，可想見柳氏撰文時的激切情緒，諸如：「耗矣哀哉」、「痛矣哉」、「無忘此悲慘之紀念日哉」、「成功之目其不瞑哉」等感嘆語的大量使用；援詩起文的方式，則表達對時局淪落的無奈，諸如：「玉樹歌殘亦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南都之敗段）、「雨夜孤舟宿鏡湖，秋聲蕭瑟滿菰蒲」（湘粵之亡段）、「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誰臥薪」（三藩之師段）、「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虜風寒」（虜政之腐敗段）等語，頗能引人共鳴；至於文末短詩的寫作，似可窺見詩界革命的餘緒，諸如：「民族大復仇，男兒速努力。誓將長白山，遍染腥紅血」（揚州嘉定江陽之屠戮及剃髮令段）、「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為仇讎不為恩。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楊韋之變段）、「一卷編年漫殺青，漢家遺事拾零星。殘陽故國知何處？惆悵江南野史亭」（結論段）多數以淺近白話書寫，已脫舊詩格律。

本文雖然略具南明史的初步規模，但柳亞子並未擴充書寫，「倉猝從事以三周之期成此區區一小冊子」，等到日後廣泛閱讀南明史籍之後，才逐漸形成以編年為主軸的《南明史綱》。

## （二）戰火春秋：《南明史綱》

《南明史綱》是柳亞子從事「南明書寫」著力甚深的一部著作，歷經日軍侵華的戰火威脅，輾轉成書，以下就其成書過程、內容一探究竟。

### 1·成書過程

大部分學者多以六卷本《南明史綱》，視為《南明史綱》初稿，但根據其子柳無忌編纂《柳亞子年譜》所載，《南明史綱》初稿應為四卷，完成於1939年8月，六卷本完成於次年10月底<sup>31</sup>，並非真正的初稿，

<sup>31</sup> 《南明史綱》四卷本及六卷本記載，參見柳無忌，《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

換言之，《南明史綱》初稿本有四卷本和六卷本兩種，取資內容接近。相較於日後阿英、胡樸安、鄭振鐸等人對柳氏取得南明史籍的資助，寫作《南明史綱》初稿時的參考用書就顯得十分「寒儉」，內容相對「薄弱」<sup>32</sup>，除官修《通鑒輯覽》外，僅有幾部私人撰作的野史，聊備一格。此外，柳氏還參酌溫睿臨四十四卷本《南疆逸史》、葉紹袁《甲行日注》、南沙三余《南明野史》對於月朔干支的時間計算方式，於1939年8月完成「以一六四四年明曆五月朔日起，至一六六二年明曆四月望日為止」的《南明史綱曆日表》，此書未能刊行於世，「原稿亦不知下落」，僅可由〈《南明史綱曆日表》自序〉略知其內容，實為可惜<sup>33</sup>。

在柳氏觀念中，「中國舊時的史籍，嚴格講起來，是不能稱為歷史的」<sup>34</sup>，因此他「不敢僭稱研究南明歷史，而只稱為研究南明史料」<sup>35</sup>，對於從事「南明書寫」所抱持的理想是：「想把史料整理得完備一些，以便當代具有唯物史觀學識的歷史家作為參考時方便一些，這就達到我的目的了」<sup>36</sup>。《南明史綱》以編年方式寫成，從仿作對象到撰作目的，柳氏也提出說明，其言曰：

所謂《南明史綱》，可說是模仿朱熹的《通鑒綱目》而作的；只是有綱無目吧了。……實實在在就是王安石所謂「斷爛朝報」而已。不過，這個「斷爛朝報」寫成了對於我是很有用的。因為從一六四四年到一六八三年止的史實，看了這一本「斷爛朝報」，就可以一目了然，不必要去翻《南疆逸史》的紀略和〈鄭成功傳〉了。<sup>37</sup>

---

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04八月條、頁107十月條。另，柳亞子為〈《南明史綱》自序〉一文註記「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三日」亦可為印證，參《南明史綱·史料》，頁420。

<sup>32</sup> 據《南明史綱·史料》，頁294-295所載：「除了國光本四十四卷《南疆逸史》外，只有查繼佐的《罪惟錄》、《東山國語》，沈起的《東山國語補》、南沙三余氏的《南明野史》，全祖望、趙之謙的〈張蒼水年譜〉，匪石的〈鄭成功傳〉和清代官修的《通鑒輯覽》而已」。

<sup>33</sup> 柳氏曆日表自序同上註，頁420。

<sup>34</sup> 同上註，頁292。

<sup>35</sup> 同上註。

<sup>36</sup> 同上註。

<sup>37</sup> 同上註，頁294。

上述《通鑒綱目》應指《御批資治通鑒綱目》一書，1901年前後的青少年亞子曾仿其體例，輯史事為《河東綱目》一編<sup>38</sup>。所謂「斷爛朝報」，主要是針對史事以編年體滙集產生斷續書寫的現象而言，柳氏雖自述不過「書生伎倆」，但堅信《南明史綱》可以裨補明季遺籍「各自為紀，不易貫串，不便記誦」的弊病，自視甚高。然而，他也不諱言自己在史學方法的不足，又言：

我雖然相信唯物史觀而不太能夠懂得它，又因為我對於新的歷史學是完全門外漢，所以南明史料研究的結果，最好也只是史料搜輯的完成吧了。<sup>39</sup>

既然無法在研究方法上推陳出新，柳亞子選擇以充實《南明史綱》史料內容為主要工作，透過友人的穿針引線，取得南明重要史料，勤於研讀、抄錄相關史籍，尤其在尋索《南疆逸史》版本上格外用心<sup>40</sup>。離滬之前，柳亞子為《南明史綱》初稿六卷本進行第一次修訂，以五十六卷《南疆逸史》、《小腆紀傳》、《殘明大統曆》、《殘明宰輔年表》、《晚明史籍考》、《小腆紀年》等書為主要參考用書。修正本與原本不同之處，在於以修正、擴充史實為主軸，並訂下：「擴大《南明史綱》的篇幅，訂正《小腆紀年》的謬誤，勒成《南明紀年》一書，作為我南明史料研究的第一種成績」<sup>41</sup>、「以賤注《南疆逸史》為初步工作，而以另撰一部《南明史》為最後工作」<sup>42</sup>等目標。此外，柳氏又與鄭振鐸商議影印晚明史料叢書計畫，提出編輯南明史料的構想，進一步將「南明史料叢輯的編印，

<sup>38</sup> 柳亞子自撰年譜時將此事載於1901年（《自傳·年譜·日記》，頁8），柳無忌為《柳亞子年譜》亦載1901年（頁12），但柳亞子在《南社紀略·我和南社的關係》（頁9）中，則是將與《河東綱目》同年完成的〈上戴滄萬言書〉以「大概是1898年到1900年時候做的」含糊帶過，撰〈五十七年〉（《自傳·年譜·日記》，頁120）一文時雖發現舊說歧異，乾脆以「時移世異，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任其兩說並存」簡單交待，是以無法確知《河東綱目》寫作時間。

<sup>39</sup> 見《南明史綱·史料》，頁304。

<sup>40</sup> 柳氏為得見鄭氏所藏溫睿臨晚年定稿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先透過阿英向鄭氏說明自己訪求該書的心意，再經女婿石華父借得，以二十天時間，成功抄錄一部副本。事載〈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同上註，頁298-301。

<sup>41</sup> 同上註，頁303。

<sup>42</sup> 同上註，頁306。

和南明紀年及南明史的寫作」作為整個「研究南明史料最後的目的」<sup>43</sup>。善於利用傳媒力量的柳氏，在《南明史綱》初稿六卷本修正稿完成後，隨即於香港《大風半月刊》陸續發表，企圖引起在港南明研究者的注意。

柳亞子初到香港半年，又完成《南明史綱》第二次修訂，內容由六卷擴大到八卷，第三次稿本採隨增隨刊方式，繼續在《大風半月刊》發表，並計畫改名《南明紀年史綱》，以符合編年體例。不過，《大風半月刊》自 1941 年 2 月 20 日（第 84 期）至 12 月 5 日（第 102 期）近十月的刊載，受日軍入侵港九影響，僅刊齊七編，獨缺永曆帝 33 年至 37 年的《南明史綱》文本。今本八卷的《南明史綱》初稿，則是由柳無忌等人「以《大風半月刊》所載從第一編至第八編上的印刷件作為底本，參照現存該稿的各種六卷本，以移花接木的辦法，補全《大風》未得刊完的第八編」<sup>44</sup>，柳亞子大作得以傳諸後世。

## 2·今本《南明史綱》初稿內容

《南明史綱》雖然多次校訂，最初以六編形式出現，目前所見版本仍以「初稿」為名，共成八編，茲將其編目及各年起迄月份羅列於下<sup>45</sup>：

第一編	甲申	威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按：1644 年為清順治元年）（五月至十二月）
	乙酉	安宗簡皇帝弘光元年（正月至閏六月）
第二編	乙酉	紹宗襄皇帝隆武元年（七月至十二月）
	丙戌	隆武二年（監國魯元年）（正月至十二月）
第三編	丁亥	宗匡皇帝永曆元年（監國魯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戊子	永曆二年（監國魯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己丑	永曆三年（監國魯四年）（正月至十二月）
第四編	庚寅	永曆四年（監國魯五年）（正月至十二月）
	辛卯	永曆五年（監國魯六年）（正月至十二月， <span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0 2px;">六</span> ）

<sup>43</sup> 同上註，頁 309。柳氏規劃的南明史料叢輯分「紀傳體」、「編年體」、「延平三世不拘體裁」、「傳記類」、「其他」五輯收集相關史料，之後再參照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分段落，加標點的編輯形式出版，但最後並未完成。

<sup>44</sup> 文見柳無忌〈編後記〉，載《南明史綱·史料》，頁 451，註 2 詳述今本《南明史綱》編輯技法，可為參考。

<sup>45</sup> 起迄月份後有數字者，指僅載當月初一日期，並無內容，統一以方框標示之。

- 壬辰 永曆六年（監國魯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四、十二）
- 癸巳 永曆七年（監國魯八年）（正月至十二月，八、十一）
- 第五編 甲午 永曆八年（監國魯九年）（正月至十二月，九）
- 乙未 永曆九年（監國魯十年）（正月至十二月，七、十、十一、十二）
- 丙申 永曆十年（監國魯十一年）（正月至十二月，閏五、十一）
- 丁酉 永曆十一年（監國魯十二年）（正月至十二月，五）
- 第六編 戊戌 永曆十二年（監國魯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六、十一）
- 己亥 永曆十三年（監國魯十四年）（正月至十二月）
- 第七編 庚子 永曆十四年（監國魯十五年）（正月至九月，二、六、十、十一、十二）<sup>46</sup>
- 辛丑 永曆十五年（監國魯十六年）（正月至十二月）
- 壬寅 永曆十六年（監國魯十七年）（按：1662年為清康熙元年）（正月至十月，七、十一、十二）
- 癸卯 永曆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二、四、五、八、九）
- 甲辰 永曆十八年（正月至十月，四、五、十一、十二）
- 乙巳 永曆十九年（正至八月，二、三、五、六、九、十一、十二）
- 丙午 永曆二十年（正月、八月、九月）
- 丁未 永曆二十一年（正月）
- 戊申 永曆二十二年（正月）
- 己酉 永曆二十三年（正月、七月、九月）
- 庚戌 永曆二十四年（正月）
- 辛亥 永曆二十五年（正月、九月）
- 第八編 壬子 永曆二十六年（正月）
- 癸丑 永曆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月）
- 甲寅 永曆二十八年（正月至十二月，二、八）

<sup>46</sup> 本年二、六、十、十一、十二月不僅未載該月史實，連月份都沒有標示出來。以下各年月份以方框註記者亦同，若月份記載過少，則直接註明月份。

- 乙卯 永曆二十九年（正月至十月，三、七、八、十一、十二）
- 丙辰 永曆三十年（正月至十二月，二、三、四、六、七）
- 丁巳 永曆三十一年（正月、二月、三月、六月、十二月）
- 戊午 永曆三十二年（正月至九月，五、十、十一、十二）
- 己未 永曆三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二、五、八、九）
- 庚申 永曆三十四年（正月至三月）
- 辛酉 永曆三十五年（正月、二月、六月、十月）
- 壬戌 永曆三十六年（正月）
- 癸亥 永曆三十七年（正月、六月、閏六月、八月）

從上列表可見，整部《南明史綱》雖然採行編年方式寫作，但不免有頭重腳輕的現象：第六編之前，每一年的史實記載，不僅「逐年」，同時也「逐月」，史實篇幅相當接近；第七編後，則如斷簡殘編，雖有「逐年」，但不「逐月」，空有月名而無內容，尤其永曆二十一年後，有時僅以當年正月「延平王在東寧」一語就草草做結。

此外，《南明史綱》尚有體例繁簡不一的情形，以永曆十三年和永曆十四年正月至五月記載對照說明：

永曆十三年

春正月巳朔、乙未、丙申  
 閏正月壬戌朔、癸亥、辛未、丙子、丁丑、  
 己卯、辛巳、壬午、乙酉、丙戌、己  
 丑、庚寅、辛卯  
 二月壬辰朔、丁酉、丙申、己酉、乙卯  
 三月辛酉朔  
 四月辛卯朔  
 五月辛酉朔、甲子、乙丑、丁卯、戊辰、癸  
 酉、戊寅、己卯

永曆十四年

春正月丁巳朔  
 三月丙辰朔  
 四月乙酉朔  
 五月乙卯朔、甲子

兩相對照之後，明顯可見前者詳於後者，尤其永曆十三年遇閏正月，記載更詳。就史事載文觀之，永曆十三年七月丙寅，張煌言起兵得

四府、三州、二十三縣響應，柳亞子詳列其名，似乎有意表彰南明將領反清的氣勢；永曆十四年正月丁巳載德陽王、潁國公、廣國公降清之事，則簡單帶過。

推究史事載錄繁簡的原因，或許與柳亞子史料掌握的多寡有關，但是以民國史家的身分——視者，在選擇重回南明視點時，如何在相關史料中決定使用的素材，似乎可以反應柳亞子的史觀和寫作企圖。《南明史綱》基本上採取的是一種「時間+事」的形式，具有李紀祥所謂「一次性」的表述特質，編年史與曆書在文字的表述形式上十分接近，但就整個歷史表現形式而言，「時間之刻畫意識雖是一種編年意識，而歷史意識卻是可以存在於無編年處」，「當其以『時間+事』為編年史述的基型時，其絕非一種真正的基型」<sup>47</sup>。仔細觀察整部《南明史綱》，永曆二十一年以後的斷簡殘編，似乎正好反映南明政權的殘破四散，潰不成史；編年形式的採用——特別指年月日之上加上帝紀年號，即是柳亞子採用編年的真義。李氏之說可為註腳，其言：

「編」，就是「釘在牆上」、「鏤刻於時間之上」，給予一個一次性的「身分證」……編年之史的出現，就意味著人的「一次性」的本質已被揭出，並且有了形式上的表現；並且也意味著人意識到了時間之流逝性的本質，必須要及時用「編年」之方法掌握與記憶。<sup>48</sup>

歷史不可能重來，若能掌握「一次性」的生命光輝，成敗與否端由自己選擇。年過五十的柳亞子在戰火流離間完成《南明史綱》，卻仍以「初稿」稱之，可見他自己對此書的編寫並不滿意，似乎也未超越傳統史書的寫作範式；民國之後的內憂外患，使中國彷彿再次經歷南明的流離失所，這部以簡明有條的編年方式搭配淺近文言寫成的「史綱」，或許可以藉此激勵讀者對抗日軍的同仇敵愾。

#### 四、南明人物書寫：從〈鄭成功傳〉到《南明人物志》

《南明史綱》以編年為綱，囿於史材比對耗時的限制，人物敘事不

<sup>47</sup> 參見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編年」論述：時間之鏤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9月），頁220。

<sup>48</sup> 同上註，頁222。

免簡淺，諸如夏完淳、吳易等人描寫都無法暢所欲言。因此，列傳方式編寫的〈鄭成功傳〉與《南明人物志》正好可以傳記形製補《南明史綱》歷史敘事之不足；散見於各處的詩詞書寫，則另外透顯文學家筆下的歷史風情。

### （一）初試啼聲：書寫〈鄭成功傳〉

柳亞子以〈鄭成功傳〉作為書寫南明人物的試金石，其餘南明人物傳記均以打游擊的散落方式陸續寫成，多數完成於離滬的最後半年，關於南明人物的書寫，柳氏曾經如此自述：

我自一九四〇年四月，到當年十月止，零零碎碎地寫了十多篇傳記。計用文言寫的，有〈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吳易傳〉、〈孫璋傳〉、〈吳志葵傳〉、〈徐弘基傳〉、〈周之藩傳〉、〈楊娥傳〉、〈趙夫人傳〉、〈郭良璞傳〉、〈吳炎、潘樞章合傳〉、〈王錫闡、戴笠合傳〉共十一首。用白話寫的，有〈吳日生傳〉、〈夏完淳傳〉共二首。<sup>49</sup>

對照柳無忌等人編輯《南明史綱·史料》的內容，上述作品已全部收錄，但就現藏北京圖書館的《南明人物志》稿本和革命博物館所藏柳亞子手稿來看，尚有大量的諸王傳、宗室傳、后妃傳、皇考傳、儲貳傳未正式出版<sup>50</sup>。

〈鄭成功傳〉分「敘論」、「鄭成功之家世及其時代」、「成功之返國及起兵」、「金陵之失敗及台灣之攻取」、「成功之長及漢族之末路」、「結論」六節論述鄭芝龍、成功及其子孫對台灣的功績，結構井然、用字簡淺。此文與〈中國滅亡小史〉完成時間、書寫體製都十分接近，但作為柳氏第一部人物傳記而言，不僅是江南青少年第一次投稿國外刊物的成功，同時也是一首反映民族主義的英雄禮讚。《江蘇》編者按語就說：「此稿由國中寄來，作者才十六歲，內地人士思想之發達，於此可見一斑」<sup>51</sup>。〈鄭成功傳〉以「英雄」二字貫穿全文，一共使用二十四次，「敘論」

<sup>49</sup> 見《南明史綱·史料》，頁309-310。

<sup>50</sup> 北京圖書館與革命博物館稿本含《南明人物志》、《南明后妃宗藩宗》兩部，前者分上、下兩編，上編有：奇女傳二篇、義士傳六篇、遺民傳二篇、諸王傳七十二篇、宗室傳二十二篇，下編含四篇白話傳文（亞子文只二篇）；下編有：后妃傳二十二篇、皇考傳三篇、儲貳傳七篇，篇名具見上註，頁434-437。

<sup>51</sup> 見《磨劍室文錄》（上），頁5。

與「結論」就占二十次之多，其餘如：「絕代佳人」、「揭天地之豪傑」、「黃族好男兒」、「翩翩絕代佳公子」等詞也用在傳主鄭氏身上，柳亞子將鄭成功形塑成神話似的民族救星，「拒滿洲、排荷蘭、闢台灣新地」的鄭成功成為青少年亞子的新偶像，其功績可與「排異種以殖新地」的歐美英雄相提並論。在柳氏筆下，明太祖是「梟雄無賴」，鄭芝龍則是「血氣有餘，道心不足」，唯一可與白種人英雄華盛頓、瑪志尼、哥倫布等人相匹敵的成吉思汗，柳氏也以「彼蒙古種我不屑崇拜」輕蔑帶過，儼然將鄭成功視為亞洲史英雄榜的首席。

## （二）歷史書寫：《南明人物志》

柳亞子曾經以「松陵女子潘小璜」之名在 1904 年《女子世界》第 11 期發表〈為民族流血無名之女傑傳〉<sup>52</sup>一文，內容歌頌委身降清漢將李成棟軍營，冒險「大義勸君」而後自刎的無名女英雄，其餘如：〈中國女劍俠紅線聶隱娘傳〉、〈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1904 年）、〈論女界之前途〉（1905 年）、〈革命與女權〉（1906 年）、〈女子結婚後姓氏問題〉（1923 年）等文，皆足以說明柳氏尊重女性，提倡女權的時間相當早。趙夫人乃李成棟副室，他與前述的無名女傑一般，都在勸說李氏「匡復大義」後自刎而死，柳亞子將〈趙夫人傳〉列於《南明人物志》之首，正好呼應青少年時期對無名女傑的記憶。

此外，貌若天人，手執匕首行刺吳三桂未果的楊娥，也是柳氏從事「南明書寫」時十分著力的女性之一。柳亞子在傳文後附載王思訓《當壚曲》，希望「世有撰南明史者，當鄭重取裁，毋使奇女子無傳於萬稷」，同時也為楊娥撰寫年表，表彰其氣節。柳亞子編寫《南明人物志》時，特別把趙夫人與楊娥兩位奇女列在全書之前，一方面與當時盛行的傳統文化反省思潮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強國保種」論述的一環。回顧柳氏青少年之作〈女雄談屑〉，趙、楊兩位奇女事蹟早就被提及歌誦，無非再一次印證柳亞子所從事的「南明書寫」是對年少記憶的重構。《后妃傳》中，宮女郭良璞「妍麗捷敏，才兼文武」，卻因秦王孫可望部將張應科求愛一事，產生「發內宮杖殺之」、「株連窮治」的悲劇，使柳氏怒斥「適足以令梟雄齒冷」；書寫魯監國元妃張氏時用字雖少，但其「勿

<sup>52</sup> 同上註，頁 138-141。其下諸文均見此書，出處從略。

以妾故為王累，遂手碎磁盤自勿死」的深明大義，也為南明女性增添光彩。

相對於南明女性入傳的情況，成為柳亞子筆下的南明義士、遺民等男性人物，則以足為歷史範式代表者為書寫重心，諸如：吳易、夏允彝、夏完淳、吳志葵、孫璋、徐弘基、周之藩、吳炎、潘檉章、王錫闡、戴笠等人均是；書寫傳記語言的擇取，則以便利為主要考量，柳氏曾言：

我在這半年以來，寫了十餘篇關於南明人物的傳記，都是用文言文寫的，也許人家疑心我在開倒車。其實……我是絕對擁護語體文的。……不過自己是過去的人物，對於文言文，舊情未忘，有時為方便起見，不免還是寫寫。至於用文言來寫南明人物的傳記，那完全是原因於便利，……因為南明史料，根據的書籍都是文言文的，只要剪裁湊合，便可楚楚成章，事半功倍。……研究南明史料，最怕是幾種書籍內容的衝突。……要整理出一個頭頭緒緒來，非把全副精神用在考證和熔化的上面不可。如果再要做改造文字的工夫，不免一石投兩鳥，將更加困難<sup>53</sup>

將「南明書寫」的精神用在考證和熔化，是柳亞子廣收文獻的必然結果，是以熟練的文言語式乃撰寫南明人物傳記的主要選擇。

再者，就專傳與合傳書寫架構而言，產生了「文本間交互性」(intertextuality)<sup>54</sup>的閱讀效果，各傳雖然以其傳主為敘述主線，卻可以在其他傳文中，得知非傳主的重要行止。因此，我們可以在〈吳易傳〉中看到吳志葵、孫璋、夏完淳等人的記載，讀〈孫璋傳〉時，也可以看到吳易的身影；至於孫兆奎、陳子龍、錢柄等人雖無專傳可讀，柳氏也將其在南明史的特殊事蹟適時披露。亞子所寫的南明人物志合傳共有三篇，分別為：〈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吳炎潘檉章合傳〉、〈王錫闡戴笠合傳〉。夏完淳是柳亞子自幼的偶像，從 1903 年發表〈夏內史傳略〉到為夏氏父子寫合傳，製完淳年表，抄輯、批注《玉樊丙戌集》、《夏內

<sup>53</sup> 見《南明史綱·史料》〈復社名流吳日生傳〉，頁 260-261。

<sup>54</sup> 「文本間交互性」又稱「文本間性」、「互文性」，指不同文本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的關係所造成的文本特徵。參見姚文放，《當代性與文學傳統的重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 3 月)，頁 196。

史遺稿》<sup>55</sup>，柳亞子對完淳研究著力甚深，看在友人陳去病眼中，柳亞子簡直是「今之夏完淳」的化身。因此，夏完淳像是一顆亮眼的明星，時而閃爍光芒，在與其父的合傳中，夏允彝彷彿是完淳的配角，書寫篇幅遠遠不如完淳。〈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文末，柳亞子借南史氏之口，說明專注書寫完淳的原因，其云：

……余特為取而傳之，無使其泯滅無聞也。完淳附傳，《明史》僅著姓名。其餘諸家，並僅寥寥數十字。<sup>56</sup>

柳亞子寫〈夏完淳年表〉時，案語使用特別頻繁；〈江左少年夏完淳傳〉則以鋪敘方式介紹完淳出場（〈復社名流吳日生傳〉亦用此法），頗具故事性，因此，以夏完淳出現的傳文來看，援引大量史料作為佐證、批駁的依據，不僅展示柳氏掌握史料的豐富，同時可見柳氏靈動的書寫功力。除此，「文本間交互性」在〈遺民傳〉的兩篇合傳更為明顯，吳炎、潘耒章二人「生同邑，幼同志，長同學，又同隱，且同著書，而卒同難以殉」合傳合情合理；但王錫闡、戴笠二人不過「并明季南直隸蘇州吳江人」、「所擅長者頗殊異」，促成兩人合傳的原因，竟是王、戴二人「皆預聞吳炎、潘耒章《明史記》者也。其志同而道合，爰為合傳之」，可見前傳與後傳具有「文本間交互性」的特質。

柳氏雖非正統史學家，但在為南明人物寫傳時，仍有傳統史書的書寫套式，尤其文末出現「論曰」、「柳亞子曰」、「南史氏曰」等史評用語可為例證。其中「論曰」主要在諸王傳中使用，藉此提出比對、考證相關史料後的看法，純以史料真偽可信與否作考量，較少對諸王個人事蹟發抒感言。「柳亞子曰」、「南史氏曰」則多用在奇女、義士、遺民等人身上，除了糾正過去史料謬誤缺陷外，多半滲入感慨語，悲憫其人遭遇。居滬期間完成的南明人物傳記，與〈鄭成功傳〉相比，少了點年少激情，多了些成熟謹嚴。約可歸納出以下特色：一、為女子作傳強調其貞烈，如〈趙夫人傳〉、〈楊娥傳〉及《后妃傳》；二、合傳必詳述原因，如〈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吳炎潘耒章合傳〉、〈王錫闡戴笠合傳〉；三、以文言、白話為同一人作傳，如〈吳易傳〉／〈復社名流吳日生傳〉、〈夏

<sup>55</sup> 有關柳亞子對夏完淳崇拜、研究的過程，可參見白堅，〈柳亞子和夏完淳〉，《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一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0年6月），頁30-37。

<sup>56</sup> 同註53，頁160，〈南明人物志〉。

允彝完淳父子合傳〉／〈夏內史傳略〉、〈江左少年夏完淳傳〉；四、援引資料文史皆有，如〈趙夫人傳〉、〈楊娥傳〉傳末引〈趙夫人歌〉、〈當壚曲〉與《南疆逸史》、《南明野史》相互參照；五、傳文具「文本間交互性」的參考價值，各傳詳註史實參酌資料，以為徵實翻案依據，如〈吳志葵傳〉引顧炎武〈都督吳公死事略〉、夏完淳〈六哀詩〉為吳志葵、黃蜚翻案。

### （三）以詩寫史：詩歌中的「南明書寫」

除了收集史料，寫作《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等文外，柳亞子視從事收集南明文集的好友為知音，樂於題詩表示支持。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獄中不時以書信稱許柳氏〈鄭成功傳〉寫作的勇氣，待柳氏閱讀章太炎校定的《張蒼水集》後，則以七絕四首，為此校本題詞，將張蒼水加入南明的英雄名單，〈題《張蒼水集》〉詩云：

起兵慷慨扶宗國，豈獨捐軀為故王？二百年來遺恨在，珠中  
餘孽尚披猖。(之一)  
廿年橫海漢將軍，大業蹉跎怨北征。一笑素車東漸路，英雄  
豈獨鄭延平。(之三)<sup>57</sup>

此外，對夏完淳有著特殊情感的柳亞子，讀後夏氏著作後，則寫下〈題《夏內史集》〉七絕六首，慨嘆江左少年的英年早逝，也頗有史詩情味，詩云：

降旗夜豎石頭城，蹈海孤臣耻帝秦。  
國恨家仇忘不得，髫年十五便從軍。  
威虜軍中帷幄籌，長興幕府賦同仇。  
春申哭罷吳江哭，不到新亭也淚流。  
莽莽中原王氣黯，嘶風胡馬尚南來。  
傷心二百年前事，遺恨分明賦大哀。  
鷓鴣革面化鸞皇，禹甸堯封舊土疆。  
大業未成春泄漏，橫刀白眼問穹蒼。  
戰骨松山夕照黃，遼西妖夢太輕狂。

<sup>57</sup> 見《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2。

劇憐漢賊洪亨九，不道人間有夏郎。  
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風流一世宗。  
我亦年華垂二九，頭顱如許負英雄。<sup>58</sup>

亞子從十五從軍的少年完淳開始書寫，所謂「威虜軍中帷幄籌，長興幕府賦同仇」句指吳志葵、吳易二人，日後也成為《南明人物志》其中傳主。洪亨九即洪承疇，在《南明人物志》夏完淳傳文中，多次寫其為洪氏階下囚時，機警應對的場景，亦可相互參照。最後以「我亦年華垂二九，頭顱如許負英雄」作結，則是自表與完淳年少英靈的心志相通。

1907年，〈巢南書來，謂將刊長興伯吳公遺集，先期得公真亦小札一通，又得王山史先生所撰《夏內史傳》及為內史營葬事甚詳，喜極馳告，索詩紀之，應以四律〉一詩，則是柳、陳二人在收集南明史集互通有無的印證，其詩云：

吾鄉陳季子，磊落復英奇。不遠關河阻，殷勤尺素馳。  
遺聞珍義俠，喜氣溢門楣。揚扨千秋事，如君信可師。  
慷慨長興伯，曾揮落日戈。頭顱捐草莽，風雨黯山河。  
賴有文章在，煩君急網羅。遺函天賜汝，彝鼎未云多。  
雲間夏內史，束髮便從軍。江左龍飛誤，華亭鶴唳聞。  
遺骸誰護惜？後死屬王君。何日携雞酒，相從誼士墳。  
嘆息鄉邦事，蕭條淚萬行。陽秋今不作，文獻久淪亡。  
絕學唯君在，論交許我狂。昔賢如可起，回首意蒼茫。<sup>59</sup>

除上引詩外，南社成立之前，柳氏尚有〈讀松陵諸前遺集尚論其人各系以詩〉、〈三月十九日書感〉、〈四月二十五日前明永曆皇帝殉國紀念節也前十數日有滇中之捷感而賦此〉、〈四月二十五〉、〈八月二十七日明思文皇帝殉國忌辰也讀巢南詩即題其后〉、〈和巢南九月十九日顧端木、劉公旦、錢彥林、夏存古諸公三十餘人殉國大紀念節詩二首〉等詩作，皆為紀念南明志士之作，尤其選在殉國紀念日抒發懷想，更增感傷之情。南社活動時期，柳亞子「南明書寫」的詩文極少，〈楊忠文抗虜殉國忌追賦〉是少數紀念南明義士的感念詩，其序言曰：

<sup>58</sup> 同上註，頁 24-25。

<sup>59</sup> 同上註，頁 43-44。

舊曆五月二日為楊忠文先生抗虜殉國忌辰，李暉廬、沈長公諸子諧蘆祠堂致祭，余亦與焉，歸後十餘日，追賦此什。世難倉皇，不自知其言之悲矣。<sup>60</sup>

該詩寫於 1917 年，詩人竟以「我亦願為宗國死，草間偷活愧前徽」句表達以死明志的意願，可見民初時局的惶惶不安，未能滿足文人當初的革命理想。南社結束後，投入「南明書寫」工作的柳亞子，幾度路經瞿式耜、張煌言紀念亭，遂以「瑣碎徵文史，鴻泥認爪踪」向前賢秉明自己正在廣徵南明史料，以慰英靈；友人尹瘦石為瞿、張二人殉國作畫，柳氏也以「憐余未就南明史，輸與宜興畫筆尊」表達急於完成「南明書寫」計畫的心意。補充說明的是，南社遺民情感的歷史糾結尤其反映在宋明兩代前賢典範的追隨上，在《南社叢刻》中也不乏相近似的南明詠嘆，可與柳詩相互對照<sup>61</sup>。1943 年，柳亞子流離桂林期間，曾面會青年作家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十二種，這與居滬期間與阿英書信往復討論南明史劇的創作意見，應是另一次前後映照的另類書寫吧<sup>62</sup>！

## 五、結語

柳亞子出生於分湖大勝村的望族。明清之際，分湖流域已是復社、幾社文人聚集的中心，吳易、陳子龍、夏完淳等人奮勇抗清的故事更是柳亞子自小熟知的，在殷勤投入革命志業、收集鄉邦文獻，乃至於從事「南明書寫」的背後，柳氏有其特殊的「南明書寫」環境。郭沫若曾以「刪詩聖手削春秋，史述南明志悲壯」<sup>63</sup>詩句為亞子祝壽，可見柳氏研究南明史料的成就已被肯定。本文就其「南明書寫」從事研究，試擬出以下兩點結論：

<sup>60</sup> 序文同註，頁 270。下文引頁 1046〈重過瞿張二公紀念亭有作〉及頁 1141〈題瞿張二公殉國史畫，為瘦石賦〉。

<sup>61</sup> 有關南社與宋明遺民產生的歷史糾結現象，請參閱拙作，《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207-220。

<sup>62</sup> 柳氏與張氏合著南明史劇原委，可參見白堅，〈南明人物幾沈吟——柳亞子與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述略〉，《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四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3 年 11 月），頁 3-21。

<sup>63</sup> 詩名題為〈壽柳亞子先生〉，作於 1943 年原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 2 卷，今轉引自《柳亞子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頁 315。

### (一)「南明書寫」是柳亞子年少記憶的重構

青少年時期的柳亞子偶然在家中藏書閱讀《南疆逸史》與《海甸野史》，開始以〈鄭成功傳〉、〈中國滅亡小史〉等文從事「南明書寫」，之後再受陳去病廣收南明遺集的啟迪，奠定日後視南明史料為至寶的基礎。耐人尋味的是，柳亞子並沒有即刻大量從事「南明書寫」，一鼓腦兒沉浸在「欲憑文字播風雷」的南社世界，他積極拓展南社版圖，參與革命活動，有時還得分神處理南社內訌，回應新文化運動者的攻擊。然而，南社分化了，革命理想破滅了，就連他想迎頭趕上的新文化世界，也離他遠去；因此，存放在年少記憶的南明英雄成為他心靈的寄望，無視日軍炮火，他選擇在上海「活埋自己」，表面看來似乎是藉此逃離失望的世界，毋寧說是對現實不同方式的正面相迎；阿英、胡樸安等人慷慨借書、代購，不僅擴充活埋庵和羿樓的藏書，同時也為柳氏構築一個個人專屬的南明記憶，未到桂林之前，成功重構了年少記憶。令人扼腕的是，流離逃難的生活終究使他有形的南明記憶（指大量收羅的藏書）化為無形，於是，他再度向孱弱的記憶挑戰，經由〈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等文的發表，展現對年少記憶搜索的強烈意志，竭力重構戰火中的記憶。在重構記憶的過程中，柳亞子不得不向歲月低頭，感慨「追憶為難」，1944年，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的發表，彌補柳氏一度失落的記憶，同時也促成1950年柳亞子將舊藏悉數捐出的記憶分享。

### (二)「南明書寫」企圖藉歷史記憶凝聚國族認同

「南明書寫」的意義除了滿足柳氏年少記憶重構的想望外，真正的價值還在於藉由呼喚共同歷史記憶達到凝聚國族認同的作用。民族學家王明珂認為：「族群認同有其根基性的、情感的一面」，「在資源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時，人們常集體遺忘、修正或重建歷史記憶，以調整可視為『手足同胞』的人群範圍」<sup>64</sup>，在柳亞子眼中，滿人以異族身分入主中國，與其並行的四十年南明歷史簡直是漢人的血淚史，因此，他寫〈中國滅亡小史〉提醒漢人「集體遺忘」亡國已久的事實，現在所見的清朝

<sup>64</sup> 引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4月），頁416。

並非故國；在〈鄭成功傳〉定下「排異種以殖新地」的英雄條件，企圖打破二百年來「被重建的歷史記憶」，重新喚回屬於漢人族群的歷史記憶。至於《南明史綱》、《南明人物志》等相關文本的形成，基本上也是一種歷史記憶的凝聚，這一點可以從柳亞子大量收集南明史籍，再將其論述援引入文，交叉考證、批評、質疑的書寫規律得到印證；其次，在柳亞子早期與晚期的「南明書寫」作品中，儘管大環境不同，他所關注的焦點，感懷的人物，不僅未曾更改，甚至還具有連續性、擴張性，這一點在夏完淳身上尤其明顯，即使是他與阿英、張燾朗往復討論而成的南明史劇，也能得到證實。

柳亞子留予後世的「南明書寫」作品，或許不能通過史學家史才、史識的標準，也無法達成他呼喚國魂，團結漢族的理想；但是他對南明史料的執著、南明英雄的熱情，至今讀來依舊鮮明動人。【責任編校：林淑禎】

## 參考書目

### 專著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中國革命博物館編，《柳亞子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編年」論述：時間之鏤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
- 姚文放，《當代性與文學傳統的重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 柳亞子，《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柳亞子，《書信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柳無忌，《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馬金科、洪京陵編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1840—19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張明觀，《柳亞子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 期刊論文

王國平，〈柳亞子與南明史〉，《蘇州大學學報》第1期，1989

王瑞豐，〈柳亞子南明史稿收藏記〉，《古今》55期，1944年9月16日  
史全生，〈關於柳亞子對南明史的研究〉，《民國檔案》第4期，1994

白堅，〈南明人物幾沈吟——柳亞子與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述略〉，《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四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3年11月

白堅，〈柳亞子和夏完淳〉，《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第一期，香港：國際南社學會秘書處，1990年6月

李鏞，〈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下落之謎〉，《文教資料》第5期，1987

柳無忌，〈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文教資料》第5期，1987

管林，〈40年來柳亞子研究述評〉，《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1期，2001年2月

謝國楨，〈愛國詩人柳亞子與南明史乘〉，《歷史教學問題》第1期，1981

### 學位論文

林香伶，《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6月

### 審查意見摘要

#### 第一位審查人：

- 一、本文討論柳亞子的「南明書寫」，從書寫之歷程、形式到內容，皆有所論述，選題不錯，全篇架構亦完整。這樣一篇論文，以「時代感懷與族群認同的歷史重構——柳亞子『南明書寫』個案研究」為題，主標題之「時代感

懷」，在文中著墨不多，亦未能相對比較集中的討論；「族群認同」似與所述難以契合，建議用「國族」；至於「歷史重構」，語意不明。建議改題為〈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個案兩字，去之可也）。

二、文中多次用了「少年亞子」。十六歲稱「少年」好嗎？建議用「青年」，或更準確的「青少年」。

###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考察柳亞子「南明書寫」的史料蒐集與撰寫歷程，並分從南明史與南明人物二端梳理其具體內容，作者熟悉柳氏著述，亦能掌握與陳去病、錢杏邨等人的交遊影響，標舉出其重構南明歷史中所寄寓的時代感懷與族群認同，轉出新的研究視野，實具創見。行文流暢，資料豐富。以下意見供作者再作斟酌：

1. 首節「問題的緣起」將柳亞子「南明書寫」內容分為三部分：一為有關南明人物、史事的「史籍」著作，二為南明史料評介，三指以南明人物、史實為對象的文學創作。其中第一群「史籍」著作，在文中得到較大的關注，二、三群則僅簡略附記，未能充分展開討論，十分可惜。如系列南明史料評介、與張燾朗合著南明史劇十二種，其中是否也透露柳氏的時代感懷與族群認同？宜有所說明。
2. 柳氏的「南明書寫」兼採編年體與記傳體，文中分別以「一次性的表述」、「文本間交互性」表彰其特質，嘗試精神可嘉。可以再思考二個問題：一、柳氏編年體與記傳體的運用，是否有超越傳統史書之處？文中所言是普遍現象或是柳氏獨具的特質？二、傳文援引史料作為佐證，或者兩者合傳彼此關聯，是否為互文性的精義所在？

